

中国散文学视野中的《史通》

罗书华 fudanluo@hotmail.com

目 录

- 一、史学名著同时又是散文学名著
- 二、区分文史与以史衡文
- 三、言语与真实：史学与散文学的核心问题
- 四、简要：史学与散文学的又一重要原则
- 五、崇古与履新

一、史学名著同时又是散文学名著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史通》都是一部史学名著。

首先，刘知几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史学家。虽然说他在少年时代就与他的兄弟刘知柔“俱与词学知名”，早年写作的《思慎赋》也被苏味道和李峤称赞为“陆机豪士所不及”¹⁾。然而，壮年以后，他的才能、兴趣与寄托就毫无保留地转移到史学上了。对于这点，他自己非常明白，也非常得意：“吾幼喜诗赋而壮不为，期以述者自名。”²⁾在《史通·自叙》中也说自己“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几。”并且“耻以文士得

1) [后晋] 昉撰《旧唐书》卷一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3168页

2) [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4521

页。

名，期以述者自命。”³⁾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史馆度过，“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⁴⁾参与编修《高宗后修实录》、《则天大圣皇后实录》等史学著作多种，而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史通》。虽然有《文集》三十卷，但知名的文学篇章并不多。刘知几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消，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⁵⁾刘知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深知自己是只习史而不习文的陈寿一路人物。

其次，《史通》有着非常明确的写作动机与目的。《史通》是在他在任国史编撰各职位的工作之余写作的，《史通原序》说：“尝以载削除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篋，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⁶⁾（《旧唐书》说：“后数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写《史通》。”未必可信。）他之所以要写作这样一部著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史学主张与时人不尽相合，不能在史传中得到应有体现。《新唐书》说：“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着《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⁷⁾《史通·自叙》说得更为详明：“凡所著述，常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齟齬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身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快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⁸⁾他作《史通》就是要将在史传编撰中无法实现的理想，用理论的形式直接表达出来。简而言之，“若《史通》之为书也，盖

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7, 292~29

4) [后晋] 昉撰《旧唐书》卷一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3168页

5)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7, 25

6)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史通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

7) [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4521

页。

8)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⁹⁾也就是说，《史通》的写作，就是为了纠正当时史学界的种种偏颇，为史学建立体统。

现在看来，《史通》二十卷四十篇，无论是内篇的“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上、下）、“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识”、“自叙”各篇，还是外篇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黜烦”、“杂说”（上、中、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各篇，它们都是从各个角度对史学的论述，有关史家的流派、史著的体例与方法、修史的态度，以及与修史相关的各个环节与方面。同时学者对于它的性质和价值已经有所认识，徐坚以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¹⁰⁾，清人浦起龙更说：“继唐编史者，罔敢不持其律。”¹¹⁾

《史通》固然是一部史学名著，不过，如果认为《史通》只是一本史学著作，那么，这种认识也未免狭窄偏颇，辜负了刘知几的良苦用心。《史通·自叙》说得明白：“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揆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薜芥者矣。”¹²⁾《史通》不但是一个系统而深刻的史学著述，从经史子集的传统学科分类来说，它更是一部包罗万项的子学名著，从它的实际内容与影响来说，更是一部散文学名著。

首先，在《史通》中有许多内容突破了史学的边界，走向了散文与文学。

其次，刘知几论史学，总是将以文学作为参照，在文史的比较中来论史学，在他的史

7, 29

9)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7, 29

10) [后晋] 昉撰《旧唐书》卷一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3171

11)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自叙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 29

12)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291~29

学论述之中，总是可以看到文学观点。

再者，刘知几对于史学的论述，常常是从语言的层面来论述。这就自然地将史学与文学勾连在了一起。事实上，《史通》以外的文学论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喜欢在本体、目的、功用、价值、写作修养与历史等问题上费笔墨，所论多是文学的外部问题。《文心雕龙》将重心转移到文体上来，实现了由外向内的转向。不过，文体毕竟还是一个相当大的范畴，而《文心雕龙》各篇篇幅又十分有限，因此，它的论述仍然多是针对大的原则性问题发言，而言论也不免多是概括性，同时也没有突破史论的范式。而刘知几对史学与文学的论述，比如他对真实与简约的论述，这才深入到语言的内部。

更重要的是，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文与史，论文也须论史，而论史也是论文。史学本来就是文学的一部分，散文学的一部分。从文史一家的角度来看，刘知几论史也就是论文，从文史有别的角度来看，刘知几站在史家的立场来论文，反而能够更为真切地揭示文学与散文的性质。对于史传的论述，在客观上也是对散文学的论述。比如《史通·叙事》说：“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¹³⁾这里的“叙事之体”就类似于语言表达方式和人物塑造方式。其中，“直纪其才行”与“唯书其事迹”类似于叙述；“因言语而可知者”类似于语言描写；“假赞论而自见”则相当于议论。显然，语言表达方式与人物塑造方式，与其说属于史学的范畴，还不如说是散文学范畴。

正因为此，《史通》在文学，特别是散文学领域的影响甚至不会比在史学领域的影响更为深刻和长久。它对后世散文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纯粹站在文学角度的各种论述。

二、区分文史与以史衡文

《史通》既是史学史著，又是散文学名著，然而，它的目的不在将史学与文学相混合，相反，它恰恰是要将文与史区别开来，让文成为文，史成为文，阐述文与史的区别是全书的核心内容。

1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在刘知几看来，史学与文学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差异：史学虽然不可避免是用文字来对事实作记录，既有文也有事，但是，对事的实象是它的根本原则，作者之意在事而不在文，事是史传的目的，而文辞则是达到这个目的所经过的途径；文学虽然也离不开事，但它同时可以在文辞方面有所追求，作者之意在文而不在事，事未必是文的目的，文辞才是它真正的目的。着意于文辞的雕饰，那是文家的事情，史家一旦有意于此，那就模糊了文史的界限，使得史不像史，文不像文。可是，恰恰是在这点上，当代史家经常犯迷糊。他批评《周书》“文而不实”¹⁴⁾，“重规、德棻，志在文饰”¹⁵⁾，《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¹⁶⁾以为“今之所作……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鸛者也。”¹⁷⁾“以徐公（按指徐陵）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几戏，异乎真将军”¹⁸⁾。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缋彩，欲称实象，其可得乎？”¹⁹⁾“华而失实，过莫大焉”²⁰⁾，“华逝而实存”²¹⁾

14)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50

15)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49

16)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8

17)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8

18)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25.

19)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20

20)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

21)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如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夏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蜻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²²⁾

文章可以用典故习语，而史传则不宜。《叙事》篇说：“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如魏收《代史》，吴均《齐杂》，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史则否矣。”²³⁾之所以要有这样的区别，关键在于文家可以重文，而史家却不必然更加重事，必然比文章更加讲究真事。典故习语，本质上是过去的言辞，与过去的事物相适应。时移事变，与过去事物相吻合的言语，很可能难与现在的事物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在史传中如果不恰当地使用典故习语，就很可能导致记叙的失真。例子中所说的“百牢”，原来出自《左传》哀公七年，写的是吴国向鲁国征收了一百份牲牢。可是，在《魏书》中宋文帝遣使馈赠给北魏拓跋焘的并非一百份牲牢，魏收也用“百牢”一词。“朝会万国”原来也出自《左传》，说的是“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事情。吴均《齐春秋》写元旦天子朝会，宴向群臣，沿用“朝会万国”的旧典，都不免失实。

文章可以用骈语，而史传不能。“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假有辨如郗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象，多见其妄矣。”²⁴⁾在他看来，生活语言很少自然成对，骈辞俪语多半是文人的加工，而一经加工，

197, 17

22)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25

2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它便不再是生活语言的本来样子，也就是说不再真实。他举例分析说，何之元《梁典》中载梁武帝语“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嚣灭，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孙皓平”²⁵⁾，就不可能是梁武帝的原话，而必然经过了史家的加工润饰。因为“文叔”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字，安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字，按常理，梁武帝应该称呼他们的谥号而不是字。姚最的《梁后略》载梁武帝语“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孙，知复何恨”²⁶⁾，也存在类似问题。句中“变‘我’为‘予’，互文成句”应该是史家为了避免上尾之病而作的修饰，生活语言不会这样讲究。

不过，这并非说刘知几对史传的文辞不太重视，恰恰相反，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因而对文辞十分重视。《史通·叙事》就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斲，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²⁷⁾又说：“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²⁸⁾

应该说，历史与文学的本来就具有不同的性质，各自有自己的道路。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说，“诗是如何，史是如何”（待补）对于文与史的区别，在刘知几之前，论者对于文史之别就有不少论述。（待补）不过，所有这些论述都是零星的、感悟性质的。只有到了刘知几，这才将文与史看作两种相对的事物，并作专书对它们作出全面、深刻而彻底的区分。这样的区分无疑强化和加速了文、史的分途。正如将车道与人道分

24)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512~51

25)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51

26)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51

27)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6

28)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开，必将提高车行的速度与人行速度一样，这种区别也必然加速了文学与史学的发展。唐代文学与唐代散文的突然提速，刘知几的《史通》有不小的功劳。

刘知几对于文史的区分，固然体现了清晰的文体意识。不过，对于文学与史学他并不是完全对等地看待。他所强调的是维持史学自身的特点、独立性与纯洁性，对于文学的独立自足性则几乎没有提及。他只是要求史学不能与文学相同，并没有要求文学与史学不同。恰恰相反，他倒是希望文学最好能够像史学一样。凡是能在史学中得到刘知几肯定的东西，在文学内也同样能得到肯定，而在史学范畴里刘知几反对的东西，在文学范畴中也很可能会受到批判。《史通·载文》篇说：“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²⁹⁾可知，刘知不仅在史学中主张“不虚美，不隐恶”，在文学内同样主张“不虚美，不隐恶”，不仅在史学中反对淫丽，在文学中同样也反对淫丽。正是从史学的立场出发，“譬如女工之绮縠，音乐之有郑卫”两句话原本是对文学词藻正面肯定的话语（汉宣帝本来是用来说明汉赋虽然没有什么讽谏作用，但仍然辩丽可喜、具有愉悦耳目的作用），到刘知几笔下也变成了对文辞的负面评价。他批评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扬雄《甘泉》、《羽猎赋》、班固《两都赋》、马融《广成赋》等“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³⁰⁾，希望“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操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³¹⁾所用的标准，也与史传的标准相同，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以史学的标准作为文学的标准。

29)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3~12

30)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

31)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

《史通·杂说上》：“《左传》称仲尼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夫有生而无识、有质而无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设比兴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恶薰莠、荣枯贞脆而已。必言其含灵畜智、隐身违祸，则无其义也。寻葵之向日倾心，本不卫足，由人睹其形似，强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谓鸟鸣为啼，花发为笑。花之与鸟，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无喜怒，不知哀乐，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犹善笑，其智不如鸟，鸟犹善啼，可谓之说言乎？”³²⁾这段话更加清楚地反映了刘知几立足史传，从史传出发，以史衡文的特征。如果说在史传中反对将物当人，人物相提并论的拟人化写法还可以理解的话，对于文学作品中鸟啼花笑的拟人化写法也一并反对，怎么说也有些过分。史学有史学的逻辑，文学有文学的逻辑。史传中加入作者的情感与想像，让没有灵性的事物赋予情性，与史传的实象多少有些间距。可是，拟人手法，以我观物，作者情感的投入，在文学作品中就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如果连这些也一并反对，那么，文学也就难以成为文学。在这些地方，刘知几显然从史学出发，以用史学的尺度来衡量文学，以史学的标准为文学、散文学的标准，充分反映了他的史学本位论。这样的观点难称“谏论”，不过，有趣的是在散文学发展史中，这种观点不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每每在关键的时刻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言语与真实：史学与散文学的核心问题

真实是史学与文学、散文学的关键区别所在，也是整个《史通》的中心内容。《史通》四十九篇，几乎篇篇都是以真实为核点，一部《史通》，几乎可以说是对真实不同角度的论述。因此，本节拟在上面的论述之外，再加申说。

史传的灵魂是真实。自有史传以来，论者无不强调实象、真实。即使如此，在刘知几看来，史传的真实问题也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就是经典史传，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瑕疵，像孔子修《春秋》，删古诗，“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³³⁾，就有违

32)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45

3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真实原则。经书既然如此，后世史传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加严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刘知几这才时时不忘真实。

刘知几意识到，史传的真实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事真”，一是“言真”，“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以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³⁴但《史通》更多的笔墨是用在“言真”上，即从史传语言与事实相吻合的角度来论述史传的真实。它对于真实理论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他已经隐约意识到，史传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形态，它与现实形态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史传是否真实，决定于史传语言是否尽可能地贴近现实。当它与现实形态距离较近时，就给人以真实感，相反，当它与现实形态距离较远时，就给人以虚假感。史传的语言既不同于现实人物的说话，又与文人的笔墨不尽相同。史传要给人真实，就必须选择合适的语言。他说：“昔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³⁵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段话中的一些概念还相当含混，“口才”、“笔才”、“喉舌”、“翰墨”、“口语”、“笔文”、以及“丘明子长之任”、“元瑜、孔璋之才”等说法还相互夹缠在一起，难以分辨厘清。不过，他显然意识到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性质不同，因此也不能相混（“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喉舌翰墨，其辞本异”），史传语言与文学语言不同，因此也不能相混用（“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甚至也可能意识到史传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之间的区别。他的中心意思则更加明确，这就是史传应该使用史传的语言，史传语言应该尽量接近生活语言。只有这样，史传才能给人以真实感。

相对说来整个史传言语系统的复杂而言，史传中的人物语言较为单纯，因而刘知几对于人物语言真实性的论述就更为明晰。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人物都是具体时代、环境、修养、身份、性格的人，不同时代、环境、修养、身份、性格的人都有不同的语言。史

197, 38

34)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

35)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52

传的人物语言必须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而不能由史家代替他说话，说史家的话，说通用的文话。不然，就违反了真实的原则。“假有辨若郗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象，多见其妄矣。”³⁶⁾刘知几还举例说：“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翦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³⁷⁾魏收《魏书》中拓跋焘、牛弘《周史》中宇文泰有些语言，比如宇文泰论梁元帝说：“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叱斥进谗者说：“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³⁸⁾在刘知几看来就与宇文泰的身份相符，不是宇文泰所能说，不是宇文泰在说，而是作者在说，有失实之嫌。相反，像《梁太清实录》中宇文泰所说的“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³⁹⁾一类话，就是说的宇文泰自己的话。

这样的主张，说到底就是要求史传按人物语言的原生状态来作记录，要求史传语言尽可能地还原人物的本真语言。人物在生活中怎样说话，在史传中就应怎样说话。按照这样的逻辑，他对于史传中的方言土语也表示肯定与支持。王劭《齐志》因为运用了一些土话而受到人们诃责，刘知几却认为这恰恰是王劭的优长与功绩。他说：“若中州名汉，闕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原，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邵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⁴⁰⁾对于这些不免鄙野的方言土语予以肯

36)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51

37)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

38)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51.

39)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51

定,说明在刘知几的价值序列里,真实比文雅处在更高的层级。也正因为此,他对于“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霍光无学,不知一经,而述其言语,必称典故。”⁴¹⁾一类现象持鲜明的批判态度。

史传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不同,它在生活现实中并没有现成的蓝本可以模拟或采摭。相对而言,它与真实性也就更难确定与衡量。尽管如此,刘知几还是对叙述语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要求。《史通·叙事》在讨论“裴景仁《秦纪》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谢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⁴²⁾这个具体案例时,就以为彦鸾的做法不太妥当,因为“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⁴³⁾以为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将南宋裴景仁《秦纪》中的“推盘”一语改为“推案”,李百药《北齐书》将隋王劭《齐志》中的“脱帽”改为“免冠”,都是为追求文雅而远离真实。因为“案”是有足的古食器,后秦时候已经不用,“冠”是有尊卑法制的说法,北齐也没有沿用。“案”与“案”,“帽”与“冠”都是极微小的事物,并且意义相差无几,刘知几都特别拈出来加以讨论,明确指出易盘为案的做法违背了真实原则,并加以批评,可见他对叙述语言真实考究的精微。

从上面援引的事例来看,刘知几好像存在一种重真实而轻文美的倾向,为了追求真实甚至不惜以牺牲文雅为代价。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只是在过分的讲究文采,以至有损于真实的时候,刘知几这才会取真而弃文。真而不美只不过是刘知几史学的底线,既真且美才是刘知几史学的理想状态。《杂说上》篇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彪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

40)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49

41)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51

42)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4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前；申盟誓而慷慨有余，称谗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⁴⁴⁾《左传》叙事得到刘知几这样高的称赏，显然不只是因为它有多么真实，而恰恰是因为它又真实又华美。“修饰峻整”、“腴辞润简牍”、“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都是对《左传》文辞华美的形容与赞美。而诸如“区分在目”、“披靡横前”、“欺诬可见”、“煦如春日”、“凛若秋霜”、“滋味无量”、“凄凉可悯”所述的真实，也超越了一般史学所谓的真实或者说吻合事实的真实，而是一种能够将事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激发人们情感，给人以审美享受的艺术真实。这显然不是将事实简直地陈述出来就能达到的艺术效果，它包含了极高的艺术要求。

当然，刘知几的真实观并没有停留在史学领域，在文学、散文学领域里，真实同样是他的第一标准。《载文》篇在论及历代文学时说：“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以下，则论谬雷同。榘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文中“虚设”，指的是“徒有其文，竟无其事”⁴⁵⁾；“厚颜”说的是对事实加以“饰辞矫说”；“假手”主要指帝王“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假手于人；“自戾”说“同取一君之言”，对人时褒时贬，变化无常；“一概”，则是千篇一律。这里的“五失”，分而言之是“五失”，合而言之，也可以说是“一失”，也就是失于真实。“五失”只不过是不同角度的言说。“徒有其文，竟无其事”说的是整体失实；“饰辞矫说”说的是部分不实；“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是写作过程的虚假；“同取一君之言”而忽褒忽贬，说的是写作态度的虚假；千篇一律，不根据对象变化而变化，可以说是方法的虚假。显然，在刘知几心目之中，“真实”是文章生命的根本，文章得失优劣的根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真实则百病不生，缺少真实则一身是病。虚假不实文章处处显露出弊败，相反，如果能做到真实，文章就能百病俱消，有“得”无“失”。

虽然说真实是史传以及散文的生命，这是为史学与散文的本质决定的，自从有史学以

44)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45

45)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

来，论者强调真实的声音也不绝如缕，然而，像刘知几这样从语言层面来深入、细致地对真实加以论述的，仍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领域如此，在文学、散文学领域也是如此。真实在后世散文学中发展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不能不追溯到刘知几。

四、简要：史学与散文学的又一重要原则

如果说真实是刘知几史学的基本法则的话，那么，简要就是简要就是刘知几史学的高级法则。《史通·叙事》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⁴⁶⁾开宗明义地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主张。他之所以如此崇尚简约，固然因为他在文与事、文与义之间倾向于事与义相关，在他看来，繁辞缛句未必就比简约的文句更接近真实，未必能更充分地表达意义，但是，却一定会让读者的注意力更多地停留在文词方面，从而影响意义的发挥。不仅如此，简要还是节约与效率原则，同时也是作者叙作能力的直接体现。“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浹。”⁴⁷⁾

当然，刘知几之所以会这样推崇简约，还是有他的原因。在他看来，“古昔文义，务却浮词”⁴⁸⁾，而两汉三国以后的史书却“日伤烦富”⁴⁹⁾，晋代已降，更是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⁵⁰⁾至于六朝，“史道

46)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6

47)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6

48)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49)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6

50)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6

陵夷，作者芙蓉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⁵¹⁾这就是说《史通》对简约推崇，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刘知几所谓的简要，首先一点就要求用最少的字句来反映相同的事件，表达相同的意思，在他看来，能用一个字来表达的句子就不应用两个字，文字越简约越好。《春秋公羊传·成公二年》有一段记载，说郟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他们一起聘于齐国，齐“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刘知几就以为不够简约，他说：“若《公羊》称郟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逐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⁵²⁾《汉书·张苍传》在描述张苍免相的情状时说“年老口中无齿”，刘知几也以为：“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⁵³⁾（本文按，刘知几所引《公羊传》与《汉书》文字，都与今本不尽相同）这几个例子未免有些极端，好像简约是唯一的审美形态；简要只是追求字数的稀少，为了追求字数的稀少而可以置情态于不顾；衡量简要的唯一标准就是字数的多少。殊不知，文辞之美有着多种形态，简要也是美的一种，丰腴也是美的一种；即使是以简为美，也并非只是一味地追求减少字数。正如女性以瘦为美，却不知丰满其实也可以成为美，而即便是以瘦为美，瘦到皮包骨头也未必成其美。

当然，以上所举的只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刘知几所推崇的简要不可能只是指字数的绝对减省。字数的减省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他还要求“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扞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⁵⁴⁾也许因为这种意思已经超出了“简要”二字的笼盖，所以，刘知几又将

51)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52)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5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54)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它们称之为“晦”。“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⁵⁵⁾因为文字简约，意义却丰富，并且呈现方式不是显明的而是隐含的，所以称为“晦”。

为了说明什么是用晦，《史通·叙事》还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比如《虞书》中“帝乃阻落，百姓如丧考妣”⁵⁶⁾，《周书》中的“前徒倒戈”、“血流漂杵”⁵⁷⁾，《左传》中的“三军之士，皆如挟纆”⁵⁸⁾，《史记》中刘邦听说萧何逃走，“如失左右手”⁵⁹⁾，汉众军士被杀，“睢水为之不流”⁶⁰⁾，《汉书》中写董生好学，“三年不知牝牡”，翟方进罢廷尉，“门可张雀罗”⁶¹⁾等。《史通·模拟》说：“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⁶²⁾可见，刘知几并非仅仅追求文字的简少，文约事丰，言近旨远，辞

55)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56)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57)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58)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59)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60)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61)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7

62)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223~22.

浅意深，才是简要的真义。显然，这样一种主张，对于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我国散文的发展以简要为主流，与刘知几的理论主张也有一定的关系。

五、崇古与履新

《史通》的写作的基本动因固然是因为初唐史学的文史相混，不过，作为一部“辨其指归，殚其体统”⁶³⁾，想要成为一家之言的著作，不能不思考和解决史传的拟古问题。因为，历史本来就是由古今连接起来的，史传也必然是在已有史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再者，而文史相混的问题也与古今问题混为一体。

应该说，刘知几的古今意识十分强烈，《史通》中的不少篇章中都可可见古与今、拟旧与模新的对立与并提。不过，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

初看上去，刘知几好像有着明显的崇古轻今（近）倾向。《载文》篇评述文章的发展时，他说，先秦文章“不虚美、不隐恶”⁶⁴⁾，“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⁶⁵⁾，可是，“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⁶⁶⁾，包括扬雄、司马相如、班固等人在内的文章，都表现出“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⁶⁷⁾的鄙病。不过，在词赋之外的文章，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谓“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⁶⁸⁾“至于魏晋以下，则讹谬雷同。”⁶⁹⁾简直没有什么可提

6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29

64)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

65)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

66)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

67)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

的。这几乎和世俗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另外一方面，他对于古代文章其实并不迷信，相反，对于那些迷信古人文章言辞的现象，他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现在感觉非常雅洁的语言，其实恰恰是当时的日常说话，“至如鸛贲、鸛鷓，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蟠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輿人之诵也。”⁷⁰⁾古典之所以成为古典，古人文章之所以在今人看来非常雅洁，时间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举例说，“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酈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⁷¹⁾一类语言，都是“当时侮慢之词，流俗鄙俚之说”⁷²⁾，可是，前两句人们以为“不失清雅”⁷³⁾，而后两句，人们对觉得“殊为鲁朴”⁷⁴⁾，区别在于前者时间久远，后者时间新近。这类现在看起来“殊为鲁朴”的语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后人眼里也同样会呈现出古雅的面目来：“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⁷⁵⁾

68)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

69)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2

70)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

71)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

72)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

7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

74)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

75)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2~15

不仅如此，他还以为，时移事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事物，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语言，过去的语言只适合于过去的事物，不可能与当今朝代相吻合。因此，他明确反对机械地模仿过去史著文章中的语言。《因习》篇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⁷⁶⁾《模拟》篇也说：“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非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世之述者，锐志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魏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⁷⁷⁾《言语》篇说：“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⁷⁸⁾“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⁷⁹⁾机械模仿已经流逝的古人语言，不仅无法反映当今的事实，有失自然与真实，而且还常给人以乖谬的感觉。“当秦之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而淮南撰《古史考》，思欲揜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世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⁸⁰⁾

这样说来，刘知几虽然对古代文章非常崇尚，但是，他所崇尚的恰恰不是古代文章的言辞本身，而是以当时语言反映当时现实的精神，而直接的目的，则是要用古代文章的真实、自然、朴素来反对当时的骈俪和浮靡风气。如果与这个目的相违背，那么，刘知几就会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对于西魏宇文泰、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⁸¹⁾的论

76)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3

77)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22.

78)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 150~15页

79)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言》， 15

80)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模》， 21.

81)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 50

文主张，刘知几就评论说：“苏绰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⁸²⁾“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⁸³⁾。这样一种论文主张，不能不说与稍后的古文运动有着相同的精神实质。韩愈所说“师其意不师其辞”、“惟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辞必己出”，实在与刘知几上述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上面几个层次的论述中可以分明看到，《史通》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与文学领域中的《文心雕龙》双峰并峙，双水分流，它在文学领域中特别是散文领域同样也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建树、突破与影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文心雕龙》之后最伟大的文学与散文论著。可惜的是，在这方面的影响，论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82)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50

8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50

参考书目

- [宋]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卷一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后晋] 昉撰 《旧唐书》卷一〇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杂说》

Abstract

Shito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Chinese Essays

Luo Shuhua

"Shi Tong", the masterpiece of Liu Zhiji, is well known as a great historical work; however,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work in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in Chinese essays after the book "Wen Xin Diao Long" because of its numerous achievements, breakthroughs and influence. As to the influence, the writer feels sorry for being unable to identify. But he points out its primary contributions? drawing a clear dividing lin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us accelerating their development respectively. "Shi Tong" studies literature from historians' point of view, and puts forward many significant and original ideas. It emphasizes "trueness" and "simplicity", which are not only the core concepts of history, but also the cornerstone of Chinese essays. As to the issues of restoring ancient ways and innovation, Liu Zhiji not only advocates classics, but also maintains that languages in literature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lassical Literary Move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oretically paves the way for it.

Key words : Liu Zhiji Shitong Essay Trueness Simplicity